

再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资本观^{〔*〕}

——历史溯源、当代出场与新时代气象

○ 陈广亮¹, 王娟娟²

(1.北京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北京 100875;

2.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工商管理学院, 北京 100070)

〔摘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资本观不是泛指人们对资本的一般认识,而是发展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资本思想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驾驭资本实践的总结、概括。尽管中国古代存在资本的“古老形式”,中国先贤哲人也从感性认识上对资本的“古老形式”给予了丰富的总结。遗憾的是,未能自主发展为对现代资本的持续总结。必须根据资本“现代形式”在近代中国的曲折发展和当代中国的创造性发展,科学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资本观的历史生成。从精准把握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资本全方位、根本性变革角度,总结、概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资本观在新时代呈现的新气象,才能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强化发展提供思想引领。

〔关键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资本观;历史溯源;当代出场;新时代气象;再论

DOI:10.3969/j.issn.1002-1698.2018.05.010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驾驭资本实践上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新时代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对实践指导,加快现代化经济体系完善,需要也必须对社会主义创造性驾驭资本的实践经验进行总结和概括。由兰州财经大学庞庆明副教授等撰写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资本观:历史溯源、当代发展与新时代阐释》^{〔1〕}(以下简称《资本观》),为总结、概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驾驭资本实践的理论发展,分别从历史溯源、当代发展和新时代阐释等方面,进行了比较系统、全面的梳理,笔者很受启发。但与此同时,一则,由于作者把中

作者简介:陈广亮,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后,讲师,主要从事马克思资本思想研究;王娟娟,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博士生,讲师,主要从事人力资本研究。

〔*〕本文系“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教育宣传协同创新中心”项目阶段性成果。

国特色社会主义驾驭资本实践的合理性建构在资本的资金或资产意蕴上,具有使资本物化的嫌疑。二则,在阐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驾驭资本实践的历史渊源上,一方面把资本视为商品经济高级阶段的产物,另一方面又认为商品经济一般发展的古代就存在资本和人们对其认识,因而两者之间充满悖论。三则,由于对资本与资本主义混沌不分,未能对中国共产党在改革开放中创造性把握资本的曲折性、艰辛性准确概括。四则,阐释新时代资本实践,过于侧重经济层面,未能以宽广视角展现出中国共产党全方位、深层次、战略性驾驭资本的历史新气象。为表达笔者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驾驭资本实践的浅薄之见,因而作此文请教于庞庆明副教授及学界方家。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资本观的建构背景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新时代以来,我国在驾驭资本实践上,正在经历着“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正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2]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资本观,需要从理论与实践结合的角度,立足马克思主义的资本理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驾驭资本的实践进行总结和概括。

马克思资本理论系统、科学地阐明了资本出场、在场和退场原理,但并非如《资本观》言称的那样,马克思就是简单、绝对地把资本等同于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社会主义就是消灭一切商品、货币、资本;一方面,在暂时必然性上,马克思突出资本是人类从孤立、隔绝的地域性小生产走向彼此相互联系、荣辱与共的世界性大生产的必然要素。资本“现代形式”出现以前,整个人类在历时性上是一种“固定的僵化的关系”的因循,自给自足状态的承继,在共时性上是“地方性发展和对自然的崇拜”,是闭关自守式发展。资本“现代形式”的生成,不仅荡涤了“一切固定的僵化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3],使各民族的各项互相往来、互相依赖,而且促使许多民族的和地方的精神生产成为一种世界性生产。资本是实现人类走向世界历史性发展的“普照的光”。另一方面,在资本内涵上,马克思强调了资本是内容规定和形式规定的统一体,在内容规定上,资本是一种追求价值增殖的商品经济发展形式。资本对增殖的获得,一种是立足于社会的流通环节,另一种是立足于生产与流通的一定的统一。在形式规定上,资本既是驻足于流通领域、具有剥削性的社会关系,更是在流通与生产辩证统一上、具有异化或自我对立性的社会关系。资本主义下资本是一种具有双重剥削性质^[4]的资本。资本主义外,拥有劳动客观条件的劳动者可以把“自己分裂为两重身份,结果他就是他作为资本家来使用他自己这个工人”“工人作为联合体是他们自己的资本家,也就是说,他们利用生产资料来使他们自己的劳动增殖。”^[5]这就是说,马克思并没有武断地把资本和资本主义直接简单地等同起来。

尽管马克思资本理论宏观系统地勾勒了如何在占有资本文明中走向未来社

会,但在现实实践上,确实没有、也不可能为共产主义或社会主义如何运用资本留下具体的指示。“马克思也没有想到要就这个问题写下只言片语,他没有留下任何明确的可供引用的文字和无可反驳的指示就去世了。”^[6]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一度想尝试用直接消除资本的办法建设新社会,但实践遭受了挫折。因为苏俄是一个经济文化发展比较落后的小农国家,从小生产向共产主义的大生产过渡,“需要经过国家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这些过渡阶段。”^[7]新经济政策就是对无产阶级政权下驾驭资本实践的首次尝试,但绝非如《资本观》作者论述的那样,“在某种程度上重建资本主义”——它不是“从共产主义过渡到资产阶级制度”^[8],而是“从带有小农占人口多数所造成的种种特点的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一种形式”^[9]。遗憾的是,斯大林后来改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发展模式,直接把资本乃至商品经济从苏联“排挤”了出去。

新中国经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后,确实一度使资本在中国消失。改革开放以来,尽管学界在社会主义驾驭资本上做出了艰辛的探索,但是驾驭资本成为共产党的全党意志和国家共识,主要基于改革开放以来的渐进式摸石头实践——在社会主义经历计划经济到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再到市场经济的嬗变中,资本范畴和创造性建构的“公有资本”“国有资本”“集体资本”“非公有资本”等范畴的出现,才成为水到渠成的事情。

如果把党在改革开放中经过千辛万苦才成功探索、创造出的“公有资本”实践,轻描淡写地仅仅形容为“使用”,而没有上升到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创造性建构认识高度,将既不可能做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独特现代化经济实践进行全面、系统的总结和概括,也不可能做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尤其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思想进行高度、彻底的领会和精准把握。与之相对,从一脉相承马克思的资本驾驭设想和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探索资本驾驭实践、反思社会主义摒弃资本的曲折实践中,深刻总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驾驭资本的创造性实践,深刻领会党领导人民在驾驭资本实践上的重大理论创新,需要提出并建构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资本观。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资本观的历史溯源

中华文明是世界历史上创造过辉煌灿烂文化的文明类型,也是人类唯一绵延至今的文明类型。《资本观》的作者从中国古代存在的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实践角度,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资本观的建构寻找历史依据,从民族情感上而言,是值得认同的。但在严谨的理论论证上,却存在明显的漏洞。

譬如,由于不懂资本“古老形式”与“现代形式”的区别,《资本观》作者把中国西汉时期存在的盐铁官营还是私营的争论,归之于现代治理中的国家干预经济与国家放任经济的争论,值得商榷。因为中国古代,不论是居于主导地位的小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经济,还是商人资本与高利贷资本经济,本质上都是私有制经济。封建君主,把盐铁收归官营、限制私人经营的行为,本质上并不是如论者所

言称的那样,有益于整个社会,一则是为了支付封建地主阶级奢侈和腐化生活的开销,二则是为了延缓封建的小生产方式走向解体。具体来说,可能因为《资本观》作者不了解古代东方国家的生产方式——亚细亚形式(一种使农业与家庭手工业密切结合的小生产方式),也就不懂得封建统治阶级对亚细亚形式创造的剩余产品的私人占有,主要的就是以“国家(例如东方专制君主)”^[10]形式占有,这种占有的私有性,最突出地就是表现在剩余产品不是为了整个社会的扩大再生产,也不是如《资本观》作者言称的那样,为了什么“民本”“平衡两极分化”,而主要是为了封建统治阶级的“奢侈和腐化”的生活,为了“大地主们的虚荣心”。“任何一个社会阶级也不像他们那样竟有权要求维持一种传统的‘适合身份’的奢侈生活,而不管挥霍掉的钱是从哪里来的;任何一个社会阶级也不像他们那样可以放心大胆地负债累累。他们总会再站住脚,因为别人在土地上的投资为他们提供地租,并且这种地租远远超过资本家从土地取得的利润。”^[11]本来,代表新式生产方式的商品经济如果能够在中国顺利发展,将会极大地瓦解、衰竭亚细亚形式的生产方式,但正由于后者的坚固性,才长久地存在着。无怪乎马克思直陈到,“民族的生产方式具有的内部的坚固性和结构,对于商业的解体造成了多大的障碍,这从英国人同印度和中国的交往中可以明显地看出来。”^[12]

我们应该一分为二地看待中国古代对“古老形式”资本的实践。第一,必须精准把握资本的准确内涵。在《资本观》中,作者一方面把资本视为商品经济高级阶段即市场经济阶段的产物,反对把资本一般化为商品经济范畴,另一方面,又坚持归属商品经济一般发展的古代世界就存在资本。作者审视资本的二重标准,潜在地预示了对这一问题认知模糊。那么,资本的准确内涵是什么呢?在马克思的分析框架中,它是一个具有特定内容规定与形式规定的政治经济学范畴:在内容规定上,资本是一种追求价值增殖的商品经济存在形式,^[13]能否实现自身增殖是判别资本的唯一标准,“资本只有一种生活本能,这就是增殖自身,创造剩余价值”;^[14]在形式规定上,资本则既是驻足于流通领域、具有剥削性的社会关系,也是在流通与生产辩证统一上、具有异化或自我对立性的社会关系。因为能否实现自身增殖是判别资本的唯一标准,只要能够促使资本实现价值增殖,资本就会存在于一切可能的社会阶段和一定的社会形式中,而绝不仅局限在现代时期和资本主义社会一种社会形式中。无怪乎马克思一针见血地反证到,作为资本历史形式的生息资本或高利贷资本能够“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前很早已经存在并且出现在极不相同的经济社会形态中。”^[15]第二,中国古代对资本的驾驭本质上是服务于“以私人享受等等为目的”^[16]的实践。一方面,商人资本和高利贷资本确实在中国古代很早就出现,并且一度得到相当程度的发展。早在宋朝时期,就涌现的世界最早的纸币——交子,就是中国商品经济繁荣和商业资本存在的一个有力证据。另一方面,在中国整个古代时期,各种“古老形式”资本的存在,不论是商人资本,还是高利贷资本等,本质上只是在外围层面对支配社会运演的农耕经济或自然经济发挥润滑作用。如果说各种“古老形式”资本对

古代中国的生产方式发生过革命的影响,那也只是表现在对“工农业生产的这种统一体的一个自古不可分割的部分”的极其缓慢、微小的消解。马克思在资本对印度自然经济解体影响分析上,进一步引申到,“在中国,那就更缓慢了,因为在这里没有直接政治权力的帮助。”^[17]因而,虽然中国古代存在“古老形式”的资本经济甚至还十分繁盛,但由于资本的“古老形式”只能在“外部同这种生产方式(已有传统生产方式)发生关系”,因而中国古代的资本实践未能与时俱进地从内部发展为近代、现代的资本实践。

如果说中国古代的资本实践没有从内部转化为中国近代的资本实践。那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资本观直接承继的资本实践和认识应该溯源到何时? 19世纪60、70年代!因为在洋务运动以“求富”为口号创办近代工业背景下,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才应运产生。甲午战争以后,民族资本主义经济一度得到迅猛发展。仅在1895—1913年间,中国民族资本设厂规模在100万元以上的就有17家,占到中国境内资本设厂总数的43.59%。正由于资本经济在中国的实际存在和一定程度的发展,作为资本人格化代表的资本家阶级力量才在中国逐步壮大起来,代表资产阶级发展要求的意识形态分子才开始对资本关注起来。康有为、梁启超力主“以工立国”^[18],倡导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大工业,把对资本的关注由流通层面转向了生产层面。孙中山则在资产阶级意义上实现了对资本的系统思考:既主张在中国大力发展各种形式的资本,也注意节奏,重点突出——把关系国计民生的实业收归国家资本经营,^[19]允许私人资本经营次要领域,更欢迎外国资本与我国经济建设的合作;既看到了资本对现代发展的重要性,也注意到了资本在发展中的异化问题;^[20]既看到国家资本的性质和作用与国家政权性质的关联,^[21]甚至还注意到了国家资本的效能。^[22]遗憾的是,虽然资产阶级意在“资本主义”立国、强国,但由于自身的软弱性、妥协性,最终以失败告终。

《资本观》作者从经济现象上宏观勾勒了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时期的资本实践历程,但既未真正触及中国共产党创造性驾驭资本实践经历的艰辛探索和复杂考量,也未注意到中国共产党努力突破资本=资本主义的认识藩篱,却最终并未完成这一认识转变的历史局限。第一,新民主主义的资本实践,并不是一步到位的,而是经历了一个长期探索的过程。在党的一大上,由于对中国社会性质和革命性质的了解不够,“消灭资本家私有制”被确立为奋斗目标。在列宁和共产国际帮助下,中共二大明确中国社会性质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革命性质是民主主义式的。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主张“毕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于一役”的“左”倾情绪一度成为党的经济政策主导。随着以井冈山为代表的革命根据地深化对驾驭资本的经济实践,以及党对不同层次资产阶级在民族革命和国内战争中的不同表现,日益完善的“新民主主义的资本”观念成为党驾驭资本实践的指导思想。第二,新民主主义驾驭资本实践的必要性是多重因素综合的结果。一方面,中国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整体发展水平比较滞后。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中国新民主主义社会还存在着90%左右的分散的个体小农经济和

手工业经济,这是一种非常落后的前现代经济。“资本主义会有一个相当程度的发展,这是经济落后的中国在民主革命胜利之后不可避免的结果”^[23]。另一方面,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在性质上归属于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革命,革命的对象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而不是反对一般的资产阶级。更何况包括小资产阶级在内的民族资产阶级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个基础动力。第三,新民主主义对驾驭资本实践的定位是新式的资本主义。所谓新式的资本主义,既不是泛指中国的一切资本主义,也不是泛指任何时期的资本主义,而是特指在无产阶级国家政权领导下的民族资本主义。用毛泽东的话说,新民主主义驾驭资本的实践,“决不能是‘少数人所得而私’,决不能让少数资本家少数地主‘操纵国民生计’,决不能建立欧美式的资本主义社会”^[24]。这种新资本主义,和西方国家资本主义的发展不同,它不能“操纵国民生计”,必须通过无产阶级国家政权的引导和节制,做有利于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营业,并为将来向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提供必要的前提。“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就是新民主主义驾驭资本实践的基本策略。

新中国建国和社会主义在中国确立、探索时期,中国共产党对驾驭资本实践的认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资本观生成的重要历史前提。整体上而言,中国共产党在这一时期对驾驭资本实践的认识经历了既利用也限制—改造—彻底消灭资本的嬗变。1949—1953年,是既利用也限制资本的时期。1949年,虽然新中国成立了,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并没有完成,面对中国极其落后的经济境况,需要利用和充分发挥民族资本主义的生产积极性,并同时“限制和排挤那些不利于国计民生的工商业,即投机商业,奢侈品和迷信品工商业”^[25]。1953—1956年,是改造资本的时期。国民经济的恢复、民主革命的完成和社会主义经济因素的占优势,“中国内部的主要矛盾即是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26],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实现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是这一时期的主要目标。用和平赎买方式完成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是中国共产党驾驭资本实践的一个伟大创举,是对马克思、列宁资本驾驭思想的重大发展。1956—1978年,是使资本实践在中国绝种的时期。虽然1956年毛泽东提出过“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的宝贵思想,但由于主观上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复杂性、艰巨性、长期性认识不足,在严峻的国际国内环境下,对驾驭资本实践的考虑,主要立足于意识形态层面和采取敌我斗争的两极思维,缺乏对资本和资本主义差异的区分,因而出现了把资本等同于资本主义,“要使它在地球上绝种,变成历史的东西”^[27]的认识曲折。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资本观的当代生成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党和国家工作重心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向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转移,如何驾驭资本实现社会主义发展活力的极大迸发,逐步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核心议题。但与《资本观》作者仍旧以与资本主义含混不清

的资本思维总结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资本实践相区别的是,笔者认为,通过社会主义创造性探索驾驭资本的实践,党和国家才正确地辨清了资本与资本主义的异同,更系统地发展和完善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资本观。

(一)1978—1992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胆探索驾驭资本的实践

《资本观》作者把1978—1992年称之为“利用资本主义发展社会主义”时期,并不准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资本观生成,既在于中国共产党对资本的创造性实践,也在于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认识升华。在上述时期,中国共产党不仅从实践上创造性地推进了资本在中国大地的稳步发展,也在理论上历史性地走出了把社会主义认之为计划经济的思维藩篱。

20世纪70年代末,党和国家对“傻子瓜子”聘请雇工多达12人的现象,坚持“放一放”“看一看”态度。1982年党的十二大,明确“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原则。1984年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把社会主义经济的本质调整为“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28]的定位——党对社会主义驾驭资本实践的上述渐进式探索,虽然尚未彻底冲破计划经济体制的根基,却打开了长期禁锢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计划经济体制的一个缺口,并在“商品经济、价值规律这些重大问题上,冲破‘左’的思想束缚,澄清了在许多人中间存在的模糊认识”^[29],加快了我们党和国家推动经济体制转型的实践步伐。

1987年,党中央颁布《把农村改革引向深入》的文件,提出“对于某些为了扩大经营规模,雇工人数超过这个限度的私人企业,也应当采取允许存在……方针”^[30],这就为社会主义非公有制经济以资本方式经营提供了有力的政策支撑。反过来,非公有制经济以资本方式经营的广泛实践,又对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下一步实践资本方式经营产生重要启示。

在中共十三大上,全会对中国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的确认,对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基本路线的确定,特别是明确债券和股票(它们是有价证券,归属于虚拟资本)“并不是资本主义所特有的。社会主义可以而且应当利用它们为自己服务,并在实践中限制其消极作用。”^[31]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理论上正式引入资本的思想已经呼之欲出。

1989年春夏的政治风波、1991年苏联的解体和同年的“皇甫平事件”,一方面,围绕“计划”与“市场”的争论,即把社会主义尝试驾驭资本实践的争论,迅速地升级到了“姓社”与“姓资”这个事关改革开放性质和方向的思想交锋高度。另一方面,它也为党和国家廓清“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提供了良好的契机。1992年春,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对市场经济不与社会基本制度关联的正确论断,对社会主义本质的科学定位,就极大地推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资本观的理论框架搭建。因而,与《资本观》作者强调这一时期是利用资本主义发展社会主义的论点不同,通过对资本和社会主义两个维度的双重探索,并进而把资本从与资本主义的混沌中区分出,科学厘清社会主义的准确本质,才是对这一

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资本观的恰当概括。

(二)1992—2002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正式创造性引入资本话语

1992—2012年不是如《资本观》作者指称的“利用社会资本发展国有资本”时期,而是既从经济体制上推进社会主义由计划体制转向市场体制的确立时期,也是从全党共识和国家意志角度创造性地正式引入“社会主义资本”范畴时期。1992年,中共十四大提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选用何种模式关系到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全局。改革开放的实践和邓小平同志的“南方谈话”,使中国在经济体制上可以而且要求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1993年,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就如何进一步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实现改革的目标,从八个方面做出了系统化、具体化的全面改革部署,特别是全会决议《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第一次在全党意志层面,提出“资本市场要积极稳妥地发展债券、股票融资”^[32]“允许属于个人的资本等生产要素参与收益分配”,^[33]这就从资本的内容规定,也即从作为生产要素的规定上,正式引入了资本话语。

1997年,中共十五大报告中。首先,多达九处提及了资本。^[34]其次,不是明确使用“公有资本”范畴,而是创造性地构建了“公有资本”话语。之所以说是创造性地构建,这是因为,党和国家已经开始从作为生产要素的资本与作为社会关系的资本的合二为一角度,即从资本的“内容规定”与“形式规定”相统一的角度,正式地确认了社会主义驾驭资本实践的合法性和合理性。具体来说,首先,党和国家正式提出,股份制作为现代企业的一种资本组织形式,能够使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既可以被资本主义所用,也可以被社会主义运用;其次,创造性提出“公有资本”实践——如果国家和集体控股,将有利于公有资本,增强公有制的主体作用;再次,为了便于驾驭资本的实践,不仅提出利用资本纽带、借助市场环节,推进国有企业的改组、改造,实现强强联合,而且允许和鼓励资本等生产要素参与收益分配,作为对社会主义分配结构和分配方式的完善;最后,把中共十四大上尚处于概念创新的“国家宏观调控”范畴,通过诸如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健全与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等政治体制改革,落实“国家宏观调控”对资本消极性和负面作用的导引,从而确保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性质。这里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并不是性质上归属公有资本的资本形态,就天然地具有“减少或克服市场机制自然作用所带来的固有弊端或消极影响”^[35]的功效——任何资本,只要是资本,不论其性质如何,都具有这种或那种资本不可避免的局限性——而是因为社会主义国家相比于资本主义国家独有的制度优势和中国共产党的党性优势,才有效地、科学地实现了对资本弊端的疏导和抑制。《资本观》作者把公有资本完美化为对市场经济具有天然免疫的资质,显然是对资本并不成熟的认识。

1999年,在中共十五届四中全会决议《中共中央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党和国家又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资本观做了改进,不仅在公有资本中细分出国有资本,而且强调国有资本应该充分利用股份制吸引

和组织更多的社会资本,提升其控制力、影响力、带动力;允许符合上市条件的国有企业向境外资本市场筹集资本金,改善其资产负债结构和减轻其社会负担。

(三)2002—2012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资本观得到深化拓展

2002—2012年,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资本观得到深化拓展的重要时期,可惜的是,《资本观》作者仅仅一笔带过。

为了促进资本活力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极大迸发,中共十六大提出,不仅将放宽国内民间资本的市场准入领域,推进它们和公有资本在投资、税收、土地使用和对外贸易等方面,公平竞争,而且将深化资本市场的改革开放,确保各类市场主体平等使用生产要素;不仅鼓励和引导国内外资本对国家西部的建设开发,而且在多种分配方式中,推动资本、劳动、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

2003年,在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决议《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首先,在完善社会主义驾驭资本实践的原则和目标上,提出要按照“科学发展观”,根据“五个统筹”的要求,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其次,对社会主义资本的层次和功能进行了深化拓展。公有资本被明确区分为国有资本和集体资本。国有资本被确定为更多转向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以增强国有经济的控制力。只要是法律法规没有禁止的基础设施、公用事业以及其他行业和领域,非公有资本都可被允许准入。再次,创造性提出“使股份制成为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36]。因为股份制是资本的一种组织形式,公有制借助资本的组织形式实现,这就彻底冲破了公有制与“计划经济”之间的正统认识架构。最后,在社会主义如何更好宏观驾驭资本上,进一步推进政府职能的转变,明确将政府管理经济的职能调整为主要为市场主体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服务。

针对资本逐利本性总是造成不平衡的空间结构局限,譬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驾驭资本实践的30多年中,也使“城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很不平衡,人口资源环境压力加大”^[37]。为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驾驭资本的实践朝着社会和谐、人与自然和谐的方向发展,中共十七大以及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六中全会,不仅在初次分配和再分配上更加深化效率与公平的统筹协调,而且在文化发展上,鼓励国有文化向资本市场融资,赞成文化企业和社会资本对接。在农村建设上,鼓励农村的家庭经营增加资本等生产要素投入,放宽农村金融准入政策,鼓励各种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与农民的紧密结合,以提高农业生产组织化程度。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资本观的新时代气象

《资本观》作者看到了资本在中国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上的重大作用,也提出了应该建设怎样的现代化资本运行体系设想,但并未对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实践方式、历史方位、世界方位给以深入分析,也未对中国共产党在科学驾驭资本上统揽全局、协调各方的举旗定向角色给以全面、宽广、深入的理解。

首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新时代驾驭资本的实践,迈入了顶层设计与基层

实践协同发力的阶段。资本尽管是现代社会的核心元素,但并不只是作为生产要素实现促进生产力发展的作用,也同时在形式规定上具有异化或自我对立的性质。由于资本形式规定上的这一特质,马克思直陈到,“任何雇佣劳动的形式,即使一种形式能够消除另一种形式的缺点,也不能消除雇佣劳动本身的缺点。一种杠杆可能比另一种杠杆更好地克服静止的物质的阻力。但是,每种杠杆都是以阻力始终存在这一点为依据的。”^[38]资本和资本主义上层建筑的结合,更使其具有“双重剥削”的性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无论是对资本双重规定的认识,还是对社会主义何以能够驾驭资本实践的认识,在中共十八大以前,都是通过“摸石头过河”式的探索使认识和领会不断深化的。因为驾驭资本的实践是“摸石头过河”式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激发资本活力、推进经济社会发展及生态保护上,也出现了发展的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等问题。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面对国际上世界经济复苏乏力与全球性问题加剧背景和国内经济发展新常态境遇,以极具前瞻性的战略意识和宏大气魄,不仅在激发资本活力上,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全面地推动了资本元素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全部领域的深度参与,^[39]而且在党领导下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布局上,通过包括党和国家机构、意识形态、法治建设等整个社会环境的全方位、深层次变革,^[40]根本地提升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驾驭资本实践的全面、精准把握。因而,随着党和国家在驾驭资本实践上由“摸石头过河”向全面、精准把握的转变,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驾驭资本的实践,已经迈向了顶层设计与基层实践协同配合,志存高远与脚踏实地相互连接的新阶段。

其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新时代驾驭资本的实践,实现了经济文化发展相对落后的国家由“跟跑”向“并跑”和“领跑”的嬗变。在人类由前现代向现代的转型上,西方国家通过“资本主义+资本”实践道路,不仅率先完成了上述过渡,而且在其主导的世界秩序中,把“资本主义+资本”实践道路标榜和强制为向现代过渡的唯一选择、终极版本。经济文化发展相对落后的民族启动向现代转型的发展过程,实际就表现为学习和按照“资本主义+资本”实践道路推动自身向现代转型的跟跑式发展。虽然苏俄在十月革命后,创造性地探索了“社会主义+资本”的新经济政策实践道路,但由于后来改试排斥资本的斯大林模式以及对这一模式的僵化运行,最终未能完成向现代的转型。中国是古代世界一直处于领先地位的国家,但鸦片战争后才启动向现代的转型,同样经历了一个学习和按照“资本主义+资本”实践道路的跟跑过程。社会主义在中国确立特别是实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广大人民通过积极探索“社会主义+资本”的实践道路,已经使我国的发展相较于“跟跑”“资本主义+资本”达到更高的成就。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驾驭资本实践上,通过顶层与基层实践两个维度的同时发力,不仅全面地完善了“社会主义+资本”实践道路,更实际地开启了这条道路与“资本主义+资本”实践道路“并跑”

和“领跑”的发展。并且,随着新时代中华民族由站起来、富起来向强起来的新使命冲锋及其最终实现,“社会主义+资本”实践道路,将极大地拓宽经济文化发展相对落后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为世界上那些利用资本又希望保持自身特点的国家和民族提供全新选择。

再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新时代驾驭资本的实践,是追求与世界合作共赢的协同发展。“资本主义+资本”实践道路,不论是对国内还是对世界,就其空间运演的内在结构而言,是一种对立性的发展形式——不是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之间垂直式的压迫与被压迫、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就是资产阶级之间水平式、强制性的竞争关系。由于“资本主义+资本”实践道路的对立性,采用这一道路谋求现代化的传统发展遵循的是“丛林法则”,或者说“弱肉强食”,它本质上是一种围绕资本轴心、朝向“零和博弈”的历时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开创的“社会主义+资本”实践道路,就其空间运演的内在结构而言,不论是对国内还是对世界,它是通过包括政治上层建筑在内的社会诸要素对资本消极性和负面性的抑制或疏导,以促成对资本的共同驾驭和共享其文明——在国内是通过更多人对多种形态资本的参与,以实现更多人对资本文明的共同占有;对世界是通过主权国家、政府间组织(譬如联合国、“亚投行”等)、非政府组织、各国政党、民间社会等对资本共同驾驭、协同发展,以实现整个世界对资本文明的共同占有。由于“社会主义+资本”实践道路重在对资本的共同驾驭和成果共享,它本质上是一种超越资本、朝向“合作共赢”的历时发展。因而,新时代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坚持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和世界其他国家人民的美好梦想贯通起来,就是遵循“社会主义+资本”实践道路的中国从与世界一切力量共同驾驭资本、共同占有资本文明的角度,为世界走向合作共赢、协同发展的新纪元贡献的中国智慧和方案。

最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新时代驾驭资本的实践,彰显着中国共产党统揽全局、协调各方的根本特质。中国共产党的全面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做到充分发挥资本促进生产力发展的积极性,也有效抑制资本消极性和负面性以及最终在全部占有资本文明中扬弃资本的根本保证。一方面,中国共产党的“两个先锋队”性质——工人阶级先锋队和中国人民与中华民族先锋队,使她相比于资产阶级政党以及其他一切政党,不仅能够正确对待资本在现代社会发展上的二重存在,通过对资本的科学驾驭实现对资本文明的全面占有,实现中国人民的现代发展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历史使命。而且能够在资本发展达到最大程度时利用资本本身消灭资本,也就是使资本“作为经济发展的、社会财富生产的必要形式的历史根据”被正确地消除、扬弃掉。不过,中国共产党对资本的驾驭,并不是党直接地、具体地驾驭资本、治理国家,而是通过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统揽全局、协调各方实现的。另一方面,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驾驭资本实践的特征体系中,不仅有党的领导,也有《资本观》作者提到的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宏观调控,还有以人民为中心建构的党和国家机构、意识形态、发展理念等。但党的领

导和其他特征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驾驭资本实践特征体系的层次和地位上,却并不一样。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科学驾驭资本的最根本、最本质的特征,是其他特征发挥具体驾驭资本实践的逻辑前提和根本条件。党的领导之所以是最根本、最本质的特征,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视角而言,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是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而是通往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一条道路。这就是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有一个共产主义方向”^[41]的终点问题。因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只是通向共产主义的一条道路,它不可能是十全十美的,也必然在驾驭资本实践上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在开创性科学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占有资本文明,引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扬弃资本、最终向共产主义迈进上,中国共产党就是根本指引前进的主心骨、领头雁。因而,发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既有助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资本文明的全面占有,完成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也是正确地引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终朝着扬弃资本的共产主义伟大理想迈进的根本保障。

注释:

[1][35] 鹿庆明、郭志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资本观:历史溯源、当代发展与新时代阐释》,《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1期。

[2] 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6年5月19日,第2版。

[3]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4页。

[4] 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指出,资本对这种生产关系下的劳动者的剥削,不仅有“直接经济剥削”,还有“直接经济剥削之外对人民进行第二重剥削的手段,因为它保证资产阶级的家族在国家事务管理中取得所有肥缺”。因为资本主义的国家政权,“在性质上也越来越变成了资本借以压迫劳动的全国政权,变成了为进行社会奴役而组织起来的社会力量,变成了阶级专制的机器”,资本为了支付其政治代理人的阶级管理费用,譬如压制反对舆论、麻痹或摧残独立的社会运动机关,需要以“国家薪俸形式来补充它用利润、利息、租金和酬金形式所不能获得的东西”,这即资本对广大劳动人民的“第二重剥削”。因而并不像一些论者所说的那样,马克思以《资本论》为核心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只是对资本与劳动的“两主体范式”研究,而是把资本与资本存在的政治上层建筑、意识形态等整个社会环境甚至世界环境进行了尽可能全面的分析。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92页。

[5][10][11][12][15][17]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99、369、819、372、671、372页。

[6] 《列宁全集》第4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83页。

[7][8][9] 《列宁专题文集·论社会主义》,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47、216、217页。

[13] 所谓商品经济存在形式,就是说,资本绝非限于商品经济高级阶段,相反,只要商品经济存在,就必然存在资本。为说明资本和商品经济一般发展的内在关联,马克思以商人资本的存在为例指出,“它的存在——撇开由直接的物物交换所产生的各种不发达的形式不说——所必要的条件,无非就是简单的商品流通和货币流通所必要的条件。或者不如说,简单的商品流通和货币流通就是它的存在条件。”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62页。

[14]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69页。

[16]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37页。

[18] 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 戊戌变法(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227页。

〔19〕孙中山1912年《在南京同盟会会员饯别会的演说》中明确提出，“国家一切大实业，如铁路、电气、水道等事务皆归国有，不使一私人独享其利。”参见《孙中山全集》第2卷，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323页。

〔20〕孙中山1921年《在桂林对滇赣粤军的演说》讲演中提出，西方国家资本主义的发展证明，私人资本的运演必然会走向“大资本家在社会上垄断权利”，会出现“资本家以资本能力压制人民”，这是资本的“固必然之势”。参见《孙中山全集》第6卷，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27—28页。

〔21〕孙中山1921年《在桂林对滇赣粤军的演说》讲演中提出，中华民国并非满清政府，而是全体国民之国家，它对资本的驾驭，就是“为四万万人民所共有，不至于操纵于少数资本家之手，始可谓之国利民福也”。参见《孙中山全集》第6卷，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29页。

〔22〕孙中山认为，“凡百事业，公办不如私之省时省费，私人之经营，往往并日兼程，晷之足，继之以夜；官之经营，则往往刻时计日，六时事，至七时则以为劳，一日可完，分作两日，二犹不足。故往往一种事业，有官办之十年不成，民办之五年可就者。”参见《孙中山全集》第2卷，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466页。

〔23〕〔24〕《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50、678—679页。

〔2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第214—215页。

〔26〕《毛泽东文集》第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31页。

〔27〕《毛泽东选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61页。

〔28〕《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7页。

〔29〕胡绪明：《改革开放三十年党的理论创新与资本“边界意识”的理论生成》，《兰州学刊》2009年第10期。

〔30〕《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1237—1238页。

〔31〕《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6页。

〔32〕〔33〕《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1、20页。

〔34〕《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51页。

〔36〕《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4页。

〔37〕《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人民日报》2006年10月19日，第2版。

〔3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70页。

〔39〕在《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不仅37处提及资本，而且重心就是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全面迸发资本和市场活力，譬如在全面激发资本活力上，为促进各种所有制资本取长补短，准许“国有资本、集体资本、非公有资本等交叉持股”；推进公共资源配置市场化，破除各种形式的行政垄断；逐步变革注册资本实缴登记制为认缴登记制，更好服务资本便利注册；促进科技成果资本化、产业化，激发科技创新潜能；鼓励工商资本向农村投资，推进三农建设的现代转型；筹建资本化程度更高的自由贸易区，扩大资本参与更高水平竞争；降低社会资本准入门槛，提升其参与多层次文化市场建设的程度；施行生态补偿制度，推进资本的生态化发展。更好发挥政府对资本的宏观调控，主要是推进法治政府、服务型政府的建设。参见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人民日报》2013年11月16日，第1版。

〔40〕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资本运行的社会环境的全方位、根本性变革，既表现在对党和国家机构变革的整体设计上，也表现在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与“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上，还表现在明确发展理念对驾驭资本的思想指引、宪法修改等方面。

〔41〕马拥军：《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特征》，《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6年第10期。

〔责任编辑：刘 鋈〕